

前言

芸芸众生与那位偏居茫茫格林群山 (the Green Mountains) 一隅的老太太并无二致。老太太远离街坊邻舍，孤身独处而怡然自乐。在夏日的某一天，有位陌生人来到她的门前，要一杯水喝。当询问陌生人家住何处，对方告诉住在波士顿城时，她吃惊地喊了起来：“天哪！您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该有多么孤独！”在她的想象中，波士顿是一片蛮荒之地，只有那风吹雨打的小木屋，才是她的天地和宇宙中心。

就像那位老太太一样，我们总是喜欢用自己建立的一套标准模式去判断要求他人。至于他人正确与否、明智与否，都要看他们是唯我们的马首是瞻，还是与我们背道而驰来作定论；而全然不顾我们的评判尺度和理想模式如何武断专横，如何浅薄狭隘。

对于成千上万中国人那种不假思索、机械地夏来换单、冬到穿棉、或者按照某人的意志在固定的一天大家必须共同更换衣服的做法，我们不仅感到可笑，甚至给以讽刺和挖苦。然而，在美洲和欧洲，也有成千上万最有修养的贵妇人们在那种不近人情的“时尚” (fashion)

的驱使下，盲目模仿和追求奇装异服而无所不至其极。这些贵妇人的做法与中国人的习惯相比较，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那么谁的做法更理智一些？在您作出结论之前，请先看一眼那本来自然优雅，现在却被弄得稀奇古怪、丑陋变形的妇女们的轮廓和线条。您也不妨再作以下的考虑：中国人在季节来临的时候按照某人的命令更换服装的做法，与两个大洲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们不顾自己的个人趣味和爱好，却去接受一种也许是发源于巴黎或者是伦敦贫民窟中的怪样服饰的做法，两相对比，到底孰是孰非？

对于他人，我们需要多一些全面的了解，而少一些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评头论足。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反躬自省，以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来审视一下自己，那么情况将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某种更高的境界，也就是说，一个更准确的视角，用一种非世俗的、理想的、标准的人的眼光去评断我们自己和他人，那么情况将不仅是好一些，而是会更好。进一步宽广的视野不仅仅使得我们的判断更加准确合理，而且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深层意义：它将使得人们更加宽容友爱、更加和睦相处，更加认识到作为人的崇高价值。但是，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批评指责中国人比正确全面地了解他们要简单容易得多。因为东西方彼此接触了解的历史还太短暂，机会太少。我们对中国的知识大多来自于想象和猜测，而不是立足于事实。因此，对于中国人的种种误会和曲解便是很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他们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民族。现实生活比任何神奇的虚构和猜测都要丰富有趣得多，对于中国人也是如此。深深地吸引着那些虔诚的研究者的，不是为一般众人所熟悉的、经过种种笨拙歪曲的讽刺和描绘的中国人，而是他们的真实生活，还有他们那一套沿袭已久、颇具特色而停滞不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社会习俗。

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辩护，不是为了道歉和忏悔，也不是为了责备和批评，更不是为了高唱赞歌。作者本人曾在中国居住过许多年，几乎与中国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过接触，并与他们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本书所试图向读者展示的，便是我就所接触和了解的中国社会所得到的几点心得和体会。在书中，本人着力于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因素，旨在说明，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如此不可思议的一些思维模式和社会习尚，对于他们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本书所依据的，是客观事实而不是主观臆断。总之，本书力图用大视角、粗线条的几笔，描绘出真正的中国人。

安排在本书各个章节中的大量小插曲，目的在于使我们的描述的内容更加富于生活气息、更加生动有趣和易于理解。每个插曲都代表一个真实的故事，毫无粉饰夸张的色彩。如果有必要的话，作者本人可以将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牵涉其中的人物，都一一列举出来。同样，书中的每幅插图都忠实于所取材对象的本来面貌，除冲洗照片的技术之外，没有经过其他的任何加工和处理。

中国人的许多优秀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点与他们的缺陷和不足交互纠缠在一起而相映成趣。这些东西与时代共存，虽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变化非常缓慢。但是，无论何人，当真正全面了解了中国人之后，他一定会确信：这个民族有着光辉的未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终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何天爵

1895 年 1 月写于纽约

1

导 言

中国与西方的相互熟悉交往仅仅始于 30 多年以前，而中国承认欧、美各国存在的第一批条约也只签署了 50 几年。然而，那些条约只发挥了某种前期介绍性工作的作用，缺少诸如允许双方寻求和建立彼此之间任何友好关系的具体条款。只要中国口岸向外国开放贸易并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口岸仍然局限于沿海三四个城市，只要外国人在中华帝国内地的游历被禁止，只要北京的大门向各国外交代表紧紧关闭，只要我们的使团被滞留于军舰上在中国沿海四处漂荡——只要此种情形存在下去，我们西方人就无法了解中国人，而中国人也无法认识我们。

自从 1842 年 8 月 29 日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一直到 1860 年《天津条约》的订立，外国使节才被批准进驻北京，外国人也才被允许可以在帝国内地自由游历。在此之前，情况一直如上所述。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的人们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互相审视着对方。先进的、富有侵略进取性的西方人，机警灵敏，满怀渴望。他们在东方遭遇了象征保守的、代表高傲自尊、雍容自若的中国人。进取与保守相碰撞。已跨入蒸汽时代、钢铁时代、电气时代的西方虎视眈眈，直逼尚处孔子时代的东方中国。不妨作这样的想象：如果把一个近代富于进取的西方商人介绍到那位中国圣人面前，让他们彼此认识交往，并让他们各自形成对对方的印象和看法。这里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那位圣人从根本上来就明确地不愿见这位西方商人。这样，读者对东西方最初接触时的情形便会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

绝对没有交往的共同基础，也绝对没有彼此认可的共同的利益支点。确实，我们希望同中国人做生意。清政府小心翼翼地把我们与它的贸易限制在广东——我们被允许唯一可去做生意的地方，以表明它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与我们进行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正像如下情形：我们接受从牢不可破的堆垛上递下的成捆的生丝和满箱的茶叶，然后把我们的墨西哥银元和英国鸦片用传回的绳子递上去。只要这种极其细微脆弱的交易方式存在，我们的认识就是：这是限制性的，而不是令人满意的鼓励性的贸易规则。

这并不是说中国特别反对与欧美各国建立政治和经贸关系。实际上她只是不希望在任何方面扩大与西方的交往而已。清政府为了防止内地人民对郑成功抗击清军的支持和联系，于顺治 18 年（1661）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 30 里到 50 里，并尽烧沿海民居和船只，不准片板入海。清政府以酷刑保证迁海令的执行，堕毁城廓，焚烧房屋什物；越界者无论远近，均立斩（后禁令渐宽，到康熙 20 年即 1681 年，始完全撤销。——译者注）如果有人漂洋过海，到了国外，回来后他若一不小心稀里糊涂地撞在了官吏的手里，那么，作为惩罚，他的脑袋就要由刽子手砍掉。虽然许多年来这条法令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但至今

还没有正式废除。清政府规定，禁止建造任何超过 6 英尺长的片板船只。这使得所有能够进行的短程航海既无利可图，又担受风险。在不论任何国籍的船只都被拒绝进入中国的港口，中国国内又把船只限制在甚至不能作一般远途航海的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估计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待异域来客，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回访他们。这种闭关自守的唯一例外，是准许数量有限的暹罗（指泰国——译者注）商船在曼谷和某几个中国港口之间进行贸易，但这些船只需要按时注册登记。这些商船轻松地随夏季风或东南季风北上中国，然后再由冬季的西北风吹送回国，每年完成一次往返航程。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采取这一专制般的闭关自守，也不在于探究这种政策的效力是否得到了认可或者是被加以否定。然而，中国对于西方各国的特点和其地理位置一无所知，却是确信无疑、不言自明的。据说当现在的德意志帝国要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去中国谈判签订一个条约时，他们被拒绝了。在英国官员的善意斡旋下，拒绝的成命被收回。中国政府天真地宣称，根据英国代表提供的消息，德国人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民族，他们的国王是大不列颠女王的亲戚。基于这一原因，中国政府才决定谈判、签约。1870 年，当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肩负特殊使命被派往欧洲时，他吩咐将 150 多镑的食盐连同其他的行李一起装运上车，因为他已习惯吃盐，并且他有理由担心，在将要去的地方想得到食盐是很困难的。最近，也就是在 1884 年左右，有人曾偶尔听到清朝内阁的一名官员询问他的同僚，外国人结婚时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婚约，他们是否两性杂居，男女乱伦。

伴随着这种毫无根据的无知，产生的是对那些可怜不幸的动物们的风俗习惯、面貌长相的种种荒唐可笑的观念和看法。那些动物们居住在遥远的地方，对于极具影响和开化力的中华帝国，他们是鞭长莫及的。对人类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今天可以在北京或

中国其他城市的书店里找到一些图书，这些书籍里面含有对外部世界野蛮人的种种描述，其中还附有一些经过仔细处理的、用水彩描绘的插图。在这些插图中，有一类人被描绘成长耳过肩，直触地面；而另一类人则腿短出奇，不值一提；对另一类人的描绘促使研究者得出下面的结论，即中国人一定曾听说过，甚至比较准确地听说过大猩猩的样子；还有一类人的脸被画得像一个瘤子，以低浮雕的形式刻在胸脯上；同时还有一类人的脑袋被描绘成长在左手臂下面，他们携带这样的脑袋轻松自如。这样，中国对于她了解如此之少、作如此想象的人们不希望进一步密切交往，也就不足奇怪了。

在闭关自守受到干扰冲击之前，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中唯一的中心人物。在这个世界里，她是最终的支配力量。她一直是一颗恒星，一个强有力的、文明开化的帝国。在她的周围环绕着一圈令人羡慕的卫星国，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中华帝国是其中中心，其他卫星国用所有阿谀奉承中最美妙体贴的模仿来使她心满意足。他们照搬她的文明，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连政府体制都是以她为蓝本。他们还借用她的宗教。另外几个国家还采用了她的书面语（汉语），从她那里吸取文学和艺术营养。所有卫星国都对她唯命是从，视她为东方世界的最高权威和至尊的霸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争端中，她都是他们的仲裁者，她不断用武力帮助他们镇压起义和暴动。她自奉为也被公认为是他们的保护神，她是至高无上的。

在这个行星系中——我们继续探讨上文所述的这个系统，日本是一颗捉摸不定和危险的彗星。在东方，很可能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从中国攫取了如此巨大和实际的利益。她的艺术，她的语言，她的大部分的文学，还有她的至少是一种的宗教流派，都无不借取于她那伟大的大陆邻居。从日本对她的两种

主要农产品茶叶和蚕丝的称呼就能够说明他们都是从中国引进的。虽然如此，日本却一直是一个在惹麻烦添乱子的邻居，一个觊觎中国稳固的、公认的霸主地位的挑战者。那些认为中日两国之间最近的冲突是一种例外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不过是过去的十个世纪的历史在当代的重演而已。

在上述国家中，除日本之外，中国和其他国家间建立了一种明确的、彼此非常理解的友好关系。各个小国的使节们，在每一个新年都会来到北京，带着他们的贡品，向皇帝表达节日的祝福，而皇帝会亲自接待他们。当归去时，他们满载的是回赠他们国王的礼品，这些礼品总是要比他们所带来的贡品要贵重得多，因为中国皇帝的权力比他们国王大得多，财富也比他们的国王多得多。暹罗国王只有很少的几年没有向中国皇帝进贡白象。进贡的白象有的现在还活着，存养在北京的象苑中。另外，1894—1895 年的冬季可能即使不是数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几十年中的第一次，朝鲜国王没有向中国派遣每年一次的进贡使团。在此之前，中国和朝鲜的贸易大部分都是由这些使团来完成，一个阵容庞大的商人队伍被允许随使团一同前往。作为特殊的优惠，他们在买卖中被免除一切形式的任何关税。同时，在上述一些国家中还形成了一个惯例，即新国王要派遣一个专门的使团去北京告知他的继位，请求中国皇帝仁慈的恩准。这种情形对于朝鲜和越南国王尤其如此。

可以预料，这种灵活松散而又带本质性的东方关系，在思想精确严密、高度务实的西方人心中引起了许多混乱和误解。从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中，都找不到一个能表述中国所宣称的她那种控制和维系上述各小卫星国的地位和身份关系的术语，因为那种思想对我们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既然一方面缺乏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另一方面又缺乏对这种关系实质的准确理解，我们就一直把它称之为宗主和藩属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

它在本质上并不是宗主和藩属的关系。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的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后者必须定期向前者交纳定量的贡物和贡金，同时后者还必须根据规定和要求向前者提供军事力量。但是，任何藩属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被强迫去这样做。中国一直在不断地派遣全副武装的军队去帮助她弱小的邻居们镇压国内的造反和叛乱，但是她从来既没有请求也没有接受过藩属国的此类帮助。除了新年的互赠礼品之外（在这种互赠活动之中中国总是毫无例外地多予少取），不存在藩属国向中国皇帝送什么贡物贡金的情形。

虽然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是不明确、模糊的，但它对东方人却简单明了，因为这恰恰符合他们的思维和观念。他们把这种关系形容为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比如，当中国政府需要表明她和朝鲜的关系时，这种说法就会被采用，就像它被用来描述一个家庭中哥俩的亲缘关系一样。只要考虑到下列事实，即在这种不仅盛行于中国各地，而且实际上形成了她的整个政府基础的宗法家长制下，老大哥有凌驾于小弟弟之上的某种权力和责任义务，那么就不难理解连结中国和她周围弱小邻居的这种关系，它体现了一种道德权威和对正义的支配，这与我们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特别令人讨厌，因为这种关系既可随意强加于人又可随意把它取消。因此，根据主观判断可以加强或者可以回避这种关系的事实，也许能够发现这个体系中最令东方人满意的某些特点。

善于思考的人们不会奇怪，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保持着毫无疑问的霸主地位，她接受她的弱小的、欠开化的邻居们的不断的恭维和赞美，形成了整个民族的强烈的骄傲自大意识。因此，她有理由用鄙夷的感情去对待那些没有受惠于她的范例的远方的国度、那些因此也没有按她的模式去塑造自己的国度。她拥有一个自己的由谦卑的崇拜者所组成的排外的小圈子，因此不希望有任何异己者闯入其中。同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中国或多或少与印度有某些联系。同欧洲人的交往对于东亚的那个伟大的帝国到

底意味了什么，中国人从她东方的立场观点出发，有着自己在实质上正确的看法。

这就是中国对于同欧美诸国建立友好关系所持的态度。她保持着自己镇静自若，然而荒谬愚蠢的雍容自大，尤其不幸的是，与我们的交往和联系被强加于她的头上。这在她的政府和人民看来，可以公正地说，是一件极其可恶的事情。

这里不准备探讨在需要时，任何国家是否有权以武力的方式强迫另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并保持友好关系和商业往来。这一问题可以留给公认的国际法权威去回答。本书无意于就所谓的鸦片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来表明自己的看法，也不去记录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作者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忠实地准确剖析和描绘当时的真实情形（指鸦片战争——译者注）它的大致轮廓对于所有聪明的读者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每一位都能够而且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那些真实情形在中国人心中所激起的情绪，他们对此所持的观点，这些情绪和观点怎样严重地扭曲了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看法，这些看法又怎样影响了他们整个的对外关系，所有这些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了解，其更深层次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如果不把鸦片战争推到画面上来，我们就无法描绘近代真正的中国人。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鸦片战争。

不管其他许多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导致了针对中国的海陆征讨从 1842 年攻击远在广东以外的吴淞要塞，到 1860 年占领北京的北城门和毁灭圆明园），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两个字：鸦片。中国认为外国人的不满只是借口而已。通过利用这种借口他们实现了其主要目的：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把她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以倾销在印度种植的那种毒药，让她的臣民去吸食。

在中国看来，事实清楚明白，不容辩驳。早在 1842 年之前，

就鸦片不论公开还是走私贩运到中国都违犯帝国法律的问题上，广东地方政府与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发生过许多摩擦和冲突。东印度公司经营鸦片的特权被取消后，这种摩擦和冲突进一步升级。1840年（应当是1839年——译者注）特命钦差大臣林则徐被派往广东。他亲奉明确严厉的谕旨，即要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断绝鸦片贸易。这时，双方的冲突达到了顶点。林则徐到达广东后不久，即发现广东水面22只外国船上所有的鸦片价值高达900万元，这是对帝国法律公然的侵犯和无耻的亵渎。因此，根据一般的公认法则，所有这些鸦片连同运载它们的船只，都应该全部没收。林则徐命令外国人交出鸦片，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措施。最后，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被迫把鸦片交给林则徐，同时保证日后不再把鸦片运进中国港口。缴获的鸦片共有20291箱。它们被立即投入在海边高处深挖的大池中，掺以石灰和海水，彻底销毁后，残渣随潮出海。当时，许多官吏被派往现场进行严密监视，以防止任何人挟走丝毫鸦片。一个试图拿走一点的中国人被当场砍了头。毫无疑问，在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下，鸦片被片渣不留地彻底销毁了，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清政府根除鸦片贸易的决心令人敬佩，下令收缴走私的鸦片是其份内之事。而林则徐在这一事件中，他扮演的是仆人的角色，他要不折不扣忠实彻底地执行皇帝的命令。

由于这一正义和值得赞扬的行动，正如中国人所认为的，英国派遣海陆军来到了中国，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被攻占；舟山群岛也被夺取；古都南京被围困。最后清政府在刺刀的威逼下被迫在南京与大不列颠签订了和约。清政府同意赔款2100万元，其中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还有异常重要的香港岛被无条件地割让给了英国女王。

以上便是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事实。这些事实持久地影响着他们对外国人的看法。试图为促使英国人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不

满而辩解，是徒劳的，因为中国人认为即使不为鸦片，英国人也会迟早用武力对付中国。他们指出了下列事实，即在 1860 年北京被实际攻占之前，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真正停止过。皇帝的出逃和在流亡中的病死迫使清政府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允许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中国人说，只有不列颠人得到这一满足后，他们才撤下一副气势汹汹的战争面孔，而代之以调和和抚慰的口气及政策。清政府作了种种艰苦的努力，试图劝导英国与之采取协商和合作的态度，以便要么立即查禁鸦片贸易，要么逐渐使之断绝。对于这些努力，明白人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人们还知道对清政府的那些请求，英国人或者不理不睬，或者干脆予以拒绝。这一事实强烈加深了中国对西方人的认识和对他们的极度憎恨。

这就是当时形势的一些重要特点。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从她的闭关状态中被拖了出来，去正视近代的西方世界，并被迫与之建立新的、她根本不情愿接受的关系。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她痛恨在她看来西方毫无道理的侵略是非常自然的；她会误解和曲解那些真诚地希望为她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们，这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她的统治者对于近代的国际法原则和其具体内容毫无所知，支配平等独立国家间交往的准则对于他们也如同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懵懂无知，清朝统治者总是把他们的政府置于错误的位置上。因此，他们总在争取本是合法的东西也应该得胜的外交斗争中陷于失败。对这种事实他们自己心里和评论他们的人一样清楚明白。但是他们太过于傲慢自大，不愿公开承认这一事实。清政府的一位内阁成员曾对作者说：“公理和正义在哪一边并不重要。无论什么问题，我们最终总会撞上南墙。即使情况非常有利，我们也总会失去分寸，铸成大错，然后输掉。”这种悲哀的评论中所包含的道理，恐怕比说此话的人所认识到的程度还要深刻得多。

下面的一个例子本身并不太重要，然而却能够说明那位内阁



北京的一座城门

大臣是正确的。很早以来，在北京就形成了一个惯例，即无论何时皇帝外出，他所经过的街道都要关闭，禁止百姓通行。有一次皇帝即将外出，总理衙门很有礼貌地照会通知了各国驻京公使。但是将要关闭的街道并不在外国人的居住区，对他们不会有丝毫的麻烦，而且禁止通行只不过持续几个小时。然而，除一家使团没有反映外，其他所有外国使团都对清政府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在这里，清政府过分客套，反而弄巧成拙。在任何欧美国家的首都，不要说它们的市政府，更不必说它们的枢密院，都不会自找麻烦去通知外国使馆说某某街道要暂时关闭。只要需要，他们会直接把一些街道封闭一天、甚至一月。如果有外国代表对他们的行动

提出责问，他们会作出迅速而得体的驳答。

如果我们对中国人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如果能够更加全面认识到他们的缺点和优点，并且认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许多这样的优缺点，然后把这前 30 年他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全部准确地记录下来，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奇迹：中国在此阶段不是几乎没有改变其古老的传统模式，实际上她的变化非常巨大，在很大程度上基本适应了近代世界的要求。不管她的臣民表面如何，他们绝不是感觉迟钝、呆头呆脑的人。但他们在本质上既谨慎保守，又骄傲自大。在沉睡了许多世纪之后，他们被突然唤醒了。应当承认，他们不是在一种非常有利的环境中被唤醒的。想重新塑造 4 亿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需要时间。

如果就吸收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把日本人和中国人作一比较，那是没有说服力也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两个民族。一个民族很快便抛弃了他们借来的服装样式，而另一个却不愿扔掉由自己设计发明的、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一直穿到几乎变为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传统服装。在抛弃东方模式和吸取西方文明方面，日本大体上只不过摒弃了其着衣方式而已。相反地，对于中国人，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在过去多少世纪的岁月穿梭中，他们一直在缓慢地、吃力地纺织着自己穿的棉布。

除此之外，两国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即从同西方开始接触，到关系的建立和处理，形势都有利于日本而非中国，对于鸦片战争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述。正是那次战争把中国强迫纳入了所谓西方的国际体系。此后不久，日本也在刺刀下被迫向西方开关，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主持仪式，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两个国家都制订了严厉的法律，禁止输入和吸食鸦片。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同中国签订第一个条约的国家怎样看待这些法律。可以做这样一个适当的对比：当我们的官员进入日本时，他在鸦片问题上严格地遵守日本的法律，这在实际加强了日本政

府的权威；相反地，不列颠对于其立法机构关于在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动议，却横加干涉，而美国对于日本的此类立法却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在起初便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和后果，这种影响和后果非常人所能想象。几乎可以这样说，这导致了中日两国今天所处的不同地位。1872年，日本和中国还没有建立条约关系，侨居日本的一些中国人向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诉书，请求把它转交给日本政府。他们请求为在日本遭受的苦难而鸣屈伸冤。其申诉的主要内容是，他们中许多人都吸食大烟，但地方当局干涉他们，因此，他们条陈了由此而所受的折磨和痛苦，并且宣称，日本警察甚至习惯于在晚上闯入他们的卧室，去嗅他们呼吸的气味，以此判断他们是否在吸大烟。

1878年，清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允许从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中，选择几名去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美国马里兰州的首府——译者注）的陆海军学校深造。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应，但在此后的三年中，清政府都在作不懈的努力，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拒绝导致了清政府解散其留美学生事务所，并撤回其全部留美学生，而那本来是清政府促使自己与西方文明接轨方面所做的一件最具现实意义的事业。清政府非常清楚，在它迫切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时，日本政府公派的留学生，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这种给予日本而拒绝中国的恩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最近发生的甲午中日海战的结局，是不好判定的。在那些海战中，日本的几名主要指挥官都毕业于美国的海军军官学校。同样，也很难确定这一回绝在多大程度上使清政府灰心丧气，倍感屈辱；怎样使它举棋不定，不思进取；怎样使它胆小如鼠，手足无措。

在英国的所有殖民地和美国，即凡是中国移民能去的地方——事实上包括所有中国苦力确信他们能被当作人看待的所有国家，都已经通过法律禁止中国移民。但没有任何国家采取针对日



骑马的清朝官员

本移民的类似立法措施。清政府不会视它的臣民为渣滓，因而坚决反对他们向国外迁移，同时也很自然地反对各国针对其臣民的歧视性立法。

这里所作比较和对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论或者谴责。作者不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针对两个相邻的大国的两种不同待遇是否把它们同时从数个世纪的闭关状态中拖了出来，是否造成了它们彼此强烈的妒忌、猜疑；同时，作者也不准备探讨针对两个国家的不同态度事实上是否明智、是否正确。这些对比的唯一目的，是因为它们与中国今天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有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一事实。因此，任何人如果想取得对于那个伟大帝国的一个准

确的概念，并且想更进一步合理地理解那些从内部和外部相互作用的独特力量怎样使中国处于今天的状态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记住我们以上所作的对比。

在清政府被迫向西方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它毫无准备地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中，有两个人物——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实际左右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浮沉。当 1860 年英法联军到达北京的时候，咸丰的弟弟恭亲王是皇族中唯一留守京城的一员。他被推到前台，与重兵在握的各国代表议和。从那时起直到 1884 年被罢黜，他在清政府的外交内政事务中都权倾一时，炙手可热。但外国人对于李鸿章的名字可能更加熟悉。这一方面由于恭亲王深居京城，而不是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皇家头衔、赫赫威仪使一般外国人难瞻尊颜。但不管怎样，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清王朝的首脑腹心，而李鸿章则是左臂右膀。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恭亲王一开始便成功地地为清政府奠定了一套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外交体系，并创立了无与伦比的高效率的近代海关制度。同时，他消灭了帝国腹部的太平天国起义，紧接着镇压了西北省份的回民大起义，又以惊人宽厚的条件平息了外国政府对天津屠杀（指天津教案——译者注）的愤怒。他对外国公使如何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争执不休，但当他精明地预见到事情继续发展会带来危害时，便做出了让步。不仅在伊犁交涉问题上他占了俄国人的上风，而且他还根除了苦力贸易。然后在处理法国入侵交趾支那（越南——译者注）的问题上翻了船^①，但继任者仍然成功地沿袭了他的既定政策。

恭亲王是精于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把对手放到假定

^①1884年慈禧太后以奕訢在中法战争中“委蛇保荣，办事不力”为借口，将他逐出军机处——译者注